

敦煌讲座书系

敦煌的博物学世界



余欣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讲座书系

余欣 著

敦煌的博物学世界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的博物学世界 / 余欣著.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0.12
(敦煌讲座书系)
ISBN 978-7-5423-2377-4

I. ①敦… II. ①余… III. ①敦煌学: 博物学—研究
IV. ①K870.6②N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5096号

出 版 人: 吉西平
策 划: 王光辉 薛英昭
项目负责: 秦才郎加 王露莹
责任编辑: 杨万玉
封面设计: 徐晋林
版式设计: 赵 鹏

敦煌的博物学世界

余 欣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34.5 插页 4 字数 462 千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978-7-5423-2377-4 定价: 68.00 元

总序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曾经是游牧民族驰骋的舞台，也是中原王朝的边镇和经营西域的基地，更是东西文化交往的丝路重镇，蕴涵着多元文化。公元4世纪开始开凿的敦煌莫高窟，迄今仍保留着大量的洞窟、塑像、壁画，而在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写本和绘画等，数以万计，内容丰富多彩。

敦煌石窟的美术作品和藏经洞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文献，构成了百年来敦煌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加上周边石窟、简牍、墓葬出土文物，敦煌学研究的内涵并非仅仅限于敦煌。敦煌学研究的范围，涉及宗教、思想、历史、考古、语言、文学、美术、科技等等许多学科，利用敦煌保存的材料，学者们对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学术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敦煌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有的学者把敦煌学看作是一部伤心史，陈寅恪先生虽然不太赞同这种说法，但也指出当时中国研究敦煌学者不过三数人而已，且“罕具通识”。历史的车轮转到21世纪初，中国敦煌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成果涉及多个领域，可谓蔚为大观。

然而，敦煌学越是深入发展，也有着题目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的倾向。敦煌学的成果越来越多，有自己的刊物和专题会议，与

学界其他领域的沟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外界面对如此庞大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即使想略知一二，也不知从何下手。这样的倾向其实严重影响着敦煌学的发展和进步。

在 21 世纪，敦煌学的发展不仅仅要追求新材料，还要向其他学科学习，进一步更新方法，思考新问题。

我们发起编纂《敦煌讲座》书系，就是希望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撰写一套敦煌学各个分支领域的通论性著作，体现百年来国内外敦煌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代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这套书的作者队伍以中青年敦煌学研究者为主，希望新人写新书，把相关领域的敦煌学研究水平系统地呈现出来。每本著作既是作者对某一领域研究的代表作，又是能够让敦煌学领域外的人阅读、参考的读物，可以引导读者进入敦煌学的相关领域。

日本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出版过 9 本一套的《讲座敦煌》丛书，主要以不同类别的文献为基础，对敦煌学的材料做了通论性的阐述。现在 30 年过去了，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献资料基本上刊布于世，敦煌石窟的图像资料也比较容易见到了。因此，我们编纂的《敦煌讲座》书系，力图区别于传统的敦煌文献研究，希望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献到历史，从文献到艺术，从文献到各个领域，把敦煌文献与历史、艺术等学科中的某个专题结合，把敦煌学的基础知识用新的方法、新的脉络串联起来，用新的视角来阐述敦煌学的各个方面。

敦煌学博大精深，在某些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敦煌讲座》书系可以说是我们努力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期待今后敦煌学的新人谱写更加美好的篇章。

《敦煌讲座》书系编委会

（荣新江执笔）

2013 年 9 月 30 日

前言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学问的根基和精髓在于博物学。正是敦厚而鲜活的博物学传统，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性灵。博物学的“缺席”，乃是现代中国学术建立进程中的一大悲剧。我们应当勇敢地“再出发”，开启“发现之旅”，重建中国博物学传统，而敦煌文献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和思想资源，只要奋力开拓，敦煌博物学完全可以成为一块生意盎然的“试验田”。这就是本书写作的出发点。

一、何为中国博物学传统

在谈敦煌博物学之前，我们应该讨论以下几个命题：什么是博物学？什么是传统中国博物学？什么又是中国博物学传统？

我想这绝不仅仅是术语问题，而是关系到对博物学的整体认识和体悟。循名责实，原本就是博物学的根本门径，“正名”实乃“名学”之头等“枢要”。尽管我觉得很难在有限的篇幅内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况且对于读者的阅读快感而言，一上来就大谈名词概念，无疑是为文之大忌。但本着“正本清源”的精神，不妨就从这些核心理念谈起。

你若检索百度或维基，“博物学”词条的定义大致如下：“博物学是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学科，也是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传统，是指对

大自然的宏观观察和分类，它包括当今意义上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气象学、人类学等学科的部分内容。大致对应于西方所说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也译自然志。科学史上，博物学传统是与数理传统同样重要的两大研究范式。当今许多世界性难题的解决，可能仍然需要发挥博物学思维的特长。”这个定义颇为严谨，而且它把博物学的地位提升至与数理传统同等重要的科学研究范式的高度，并指出有助于世界性难题的解决，不能不说是极有见地且富于雄心的。不过，我是一位历史研究者，职业习惯从历史角度看问题，我认为这个定义不切合中国历史经验。因为说到底，仍然认为博物学是一门科学，是以现代意义上的各种学科分野对它进行界定，并且认为博物学可以对应于西方的“*natural history*”，而没有意识到中国博物学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

中国本土学术中只有“博物”或“博物志”，并无“博物学”一词。因此我主张在“博物学”中间加一个“之”字，即称为“博物之学”更为允当。然而“博物学”的用法已约定俗成，一般行文只好从众。指称前近代以前的中国博物学时，使用“传统中国博物学”，在语境明确，不会产生歧义的前提下，可以简作“中国博物学”或径作“博物学”。我坚持认为，传统中国博物学在学术源流和价值取向上，与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所著 *Naturalis Historia* 虽有交涉，内涵却不尽相同，至于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科学逐步确立主导地位时代的“*natural history*”，更是有着本质区别。

将“博物学”对应于“*natural history*”的做法，可能来自明治以降的日语翻译。在日语中，也译称“自然志”或“自然史”，被解释为“关于自然探究所得之知识结果”，被认为是“培养自然之美的情操教育”。然而“*natural history*”的发达，与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后，需要推进对新旧大陆生物类缘关系的认识的动因有关。更有学者激烈抨击，指出所谓的“大博物学时代”，其实是“世界的死物化”，华丽的博

物学图鉴饱含殖民主义政治文化。所以我很不情愿用这个词。当然，我主张弃用“natural history”，并非出于“东方主义”情结，用简单而僵化的“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结构来审视不同知识传统的差异，而是认为中国博物学的思维、内涵和理趣与“natural history”的确大相径庭，以此对译很不恰当。在我看来，在当下西文语境中，无法找出可以和传统中国博物学准确对应的词汇。所以我在英文论文中采取汉语拼音“Bowu xue”的写法，再加注说明。出乎意料的是，不少西方学者欣然接受。这反过来提示我们，应当“确立学术自尊心”（饶宗颐先生语），打出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不必“曲学”而强求与国际接轨，或者说即便要接轨，其实也可以这样接。

十余年前我试图从中国学术本源出发，重新界定博物学的内涵，并建立方法论性质的研究纲领。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仔细读过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书。据说福柯的《词与物》就是从中国博物学的奇怪的分类法获得灵感而创作的，现在国内有些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学者，提出从科学编史学的层面考虑博物学史进路的主张，就直接受到福柯的启发。《词与物》我当然是买过的，但翻了几页就束之高阁了。现在想来，这恰巧给了我从中国历史经验和知识传统出发思考的可能性。然而这项工作异常艰辛，至今我仍未能实现当初朝前迈出一大步的设想，只是展示了“在路上”的一些思考，主要体现在近年先后在上海古籍出版的《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和《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中。

这两本书的标题虽然没有出现“博物”这一字眼，却都是以写本为基于史料围绕博物学的知识社会史研究这一主题展开。我在《中古异相》的扉页提要上特地标明：研究主旨是探讨构成中国文化本源的两个互摄的“异相”，即方术与博物之学，所致力的是东亚博物学的整体构筑。不是仅仅关于物的研究，而是希望以此为线索，将它们在日常生活、宗教仪轨和东西文化交涉中的瑰丽景致，用写实的手法重绘再现，

从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重新思考博物学作为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在社会、思想和文明史上的意义。

在《中古异相》导论中，我对博物学的内涵和研究方法做了详细的阐释，现简要概括并进一步申论。通常博物学被看作只是前科学时代的粗糙的知识和技能的杂烩，或者被偏狭地认为仅仅是关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趣味杂学，但我所理解的博物学是对世界整体性图景的把握。当时给出的博物学定义如下：博物学是指关于物象（外部事物）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的整体认知、研究范式与心智体验的集合。博物与方术同为构建传统中国知识与信仰世界的基底性要素。我觉得这个定义并没有太多需要修正的地方，它包含以下几层关键性的意思：

第一，中国博物学不是科学的简陋形态，而是自成体系的知识传统，这种传统根本无法用科学去理解和统摄。换句话说，博物学与科学完全是两码事，我们不能因为博物学中涉及动物、植物、矿物等知识，而就把它当作前科学时代的不成熟产物。站在科学的立场来看待博物学，是犯了以今例古的老毛病。在当下科学至上的时代，科学崇拜大行其道，似乎只有科学和“科学地进行分析”才是唯一正确的。假如我们说博物学根本就不是科学，是自立自足于科学之外的知识传统，似乎它仅有的作为“肤浅科学”而存在的那一点价值便也受到了质疑。但我认为，博物学给我们提供的“非科学性思考”，恰恰是它的价值之所在。因此对于把博物学史作为重写科学史的新进路的努力，尽管我觉得是极富开拓性的令人尊敬的工作，但不免又感到疑惑，为何一定要把博物学纳入到科学史的框架中不可呢？我们能否另起炉灶，建立博物学自身的话语系统呢？

第二，数千年来博物与方术形成复杂的“共生文明”，成为中国学术的基调。关于博物与方术，我有一个宏观概括：现代科学“入侵”之前，在传统中国的“知识—信仰—社会架构”及其成立的过程中，方术之学和博物之学是两个最不容忽视的基底性要素，并在知识体系、信仰

世界和实践领域一直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它们既是古人观察事物、了解外界、认识“他者与自我”、应对不可预知的风险乃至贯注信仰、寄托情感的途径，也是关于宇宙观、自然观与人生观的书写、表达与应用。

第三，中国博物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是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我在此处之所以强调“理解”，而没有用“认识”，是想表明中国博物学不仅是一种知识论或认识论，更是基于人文和社会的体用，因而这种对世界的理解是饱含信仰和情感成分的“同情的了解”。譬如说，中国博物学所建立的关于自然事物的分类、描述和诠释，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天下、华夷、人伦等一系列中国人特有的秩序观。因此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我总是非常关注知识背后的观念，“万象”在传统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文本表达所隐含的心理与象征，宗教仪轨和信仰观念的渗透及其影响，个体情感与思维习惯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等维度。

第四，中国博物学的关切点并不在“物”，不是一堆关于自然物的知识，而是铄铄“天道”、“人事”与“物象”的直面自身生存世界的理解方式、人生实践和情感体验。中国古代的博物学家，其钟情于博物学，不是仅仅出于对知识本身的好奇与渴求，为了穷其赅博，“以博洽闻”而自炫于时，而是一种志趣和情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博物学的本质，不是“物学”，而是“人学”，是人们关于“人与物”关系的整体理解。这就是中国博物学传统的精神。

二、方术：生发中国博物学的风土

方术与博物的亲缘关系，已在上一节提及，由于这方面的讨论实在少得可怜，我在这里想再次着重指出。

我觉得中国博物学的最大特征就是方术气息浓厚，博物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学术源流、结构功能，无不与方术紧密关联，这一点在其他博物学的发展脉络中是见不到的。

方术在中国文化中的建构作用，我想是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但它又是被误解最深的。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方术无非是些医卜星相之类的“小技”，多少有点邪邪的味道。然而法国学者吴文学（Ngo Van Xuyet）关于《后汉书·方术传》的研究表明，方术是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理解中国知识传统与政治传统具有特殊的意义。日本学者坂出祥伸也指出，《后汉书·方术传》奠定了正史中《方术传》撰写的基本模式，编纂者们是以礼制秩序去理解术数的，实际上体现的是将术数行为纳入政治支配体系的意图。由此方术之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意义逐渐浮现出来。但是方术在学术层面的贡献，还未能有效地揭示。此处我们仅涉及它对博物学的作用，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

方术与博物学的渊源均可追溯至先秦，而其勃兴与衍变则发生于中古时代。周秦之际，方术经历关键性的转变，至春秋战国开始发育成熟，具体表现为方伎文本的“术语化”和“格式化”。战国秦汉以降，儒生的方士化和方士的儒生化，乃至在西汉后期最终合流，是“学”与“术”的洪流中最值得引人注目的趋势。方术和博物密不可分，多有互相交错融通之处，它们与儒学之间也并非隔绝的关系。在儒家经典成为官方主流文化之后，方术与博物并未退出学术思想领域，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官学”之外的两面侧翼，代表了士人对于纯粹知识、实用技艺和闲情逸致的不懈追求之境界。一方面，阴阳五行、讖纬灾异、祲祥变怪、占卜选择之学说与技术不断地汇入正统学术脉络中；另一方面，战国中期汇编方士著作而成的《山海经》所奠定的博物学传统，在魏晋时期逐渐成熟。博学之士，“一物不知，以为深耻”，无不究天地万象，察异域殊方，博观省思，穷源竟委，以期明万物之至理，登天下之大道。张华《博物志》为中国博物学确立了典范。唐宋时代，在文献考证之外，开始更为注重亲身实践和田野调查，段成式《酉阳杂俎》、段公路《北户录》、沈括《梦溪笔谈》，在《博物志》之上增添了新的实作范式。至此，中国博物学模式基本成型。大型官修类书（例如《艺文类

聚》、《太平御览》)及敦煌日用百科手册(例如《诸杂略得要抄子一本》、《孔子备问书》),代表了博物学在官、私两个方向的发展和应用。

中国博物学传统的基石,非《山海经》莫属。《山海经》可谓战国时代方士博物学之集大成者。《山海经》的编纂,即博物学的应运而生,其动因就是为了满足方士寻找海外仙境的需求,汇集知识和经验。对异域、异人、异物、异俗、异术的探索,从此成为博物学的主色调之一,博物学以地理分域为基础的知识结构模式即导源于此。假如读《山海经》,惑于其光怪陆离的奇文瑰句,没有明显感觉到这一点的话,建议从西汉刘秀《上山海经表》读起。这是第一篇明确阐发博物概念的专论,应当作为早期博物学最重要的文献来读。刘秀说:“禹乘四载,随山刊本,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祲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祲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由此可见,刘秀所理解的《山海经》博物概念,囊括山川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土贡异产、珍宝奇物、祲祥变怪、绝域殊类、远国谣俗,实际上是一个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方士所描绘的世界图景的整合。这种结构体系在《山海经》就已完成,张华不过是加以推衍而已。

其中最值得留意的是祲祥变怪与博物学知识系统的关系。祲祥原本是方术应有之义,自然也被博物学知识结构吸纳为一个主要层面,反过来看,祥瑞灾异的发现和类目的增加,其实也与博物学著作所塑造的自然观有很大的关系。战国秦汉以降所奠定的包含祲祥在内的博物学传统,因充满方术气的魏晋志怪小说和《异物志》之类的撰作之流行,使

得博物学之知识体系和异质意象扩张臻于极盛。

王瑶先生《中古文学史论》固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经典论著，但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性远超出文学范畴。书中收录的《小说与方术》一文，对于方士在建构博物学体系中的作用，以及方术与博物的互动关系，有精妙的阐发：“借了荒漠绝域的隔阂来自炫其术，又夸示珍物异宝以示其实有，所以博物地理便成了方士的专学了。《山海经》略显于汉而盛于魏晋，郭璞为作注文和图赞，后江灌亦有图赞，方士们常喜言及。因了人类的好奇心和难知底蕴的神秘感，地理博物的材料遂借着‘奇’而变为方术了。张华的‘多通图纬方伎之书’，和‘博物洽闻，世与无比’，就是属于这一类。”是方术生长出博物，还是博物酝酿出方术，恐怕永远也说不清，但我最关心的并不是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它们的“共生关系”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有必要指出的是，方术不是方士的专利，博物学也并非只是文人士大夫的雅趣。博物学兼有格物致用、开阔眼界、愉悦身心的功能，不论是使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实际效用，还是介于虚幻与真实之间的外部世界的绚丽图景，一般民众同样感到兴致盎然。这些经由实践、传闻、习业等途径所获得的知识，除了专门的著作之外，更多是通过字书、医方、书仪、类书、杂抄、蒙书等媒介以及人际传播等方式扩散开来，然后这些知识和经验逐渐沉淀为“常识”和“异闻”。考察方术与博物的制作、传播、衍变及其社会文化影响，对于探索传统中国的知识、信仰与制度的成立，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三、敦煌博物学的内涵

阐明中国博物学传统的基质和特质之后，我们可以从容地来讨论敦煌博物学了。所谓敦煌博物学，实际上是运用敦煌资料探索中国博物学世界的一种尝试，并非要生造一个新学科。古代没有清晰的学科概念。中古时代的敦煌，当然并不存在博物学这样一个学科，当时的人们也不

会自觉地意识到何种知识为博物学。敦煌文献无非是一个资料宝库，没有必要为学科合法性过于纠结，取用新旧材料以研求新问题，才是正道。敦煌文献的庞杂，蕴涵着极为丰富的信息，恰好为博物学研究的纵横驰骋提供了广阔的原野。对敦煌文献进行博物学考索，可以增进对于中国知识体系的成立史，关于自然、社会、物质的认识史，“异”的观念史，思维方式发展史诸问题的理解。这一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可开拓的余地很大。因而以敦煌文献为主要资源，从博物学的角度和方法重新解读，进行中古博物学史研究的初步尝试，是写作本书的基本思路。

专题的选取，既要从上述理念出发，又要考虑到中古时期博物学的发展脉络和社会背景，同时还要顾及敦煌文献在史料上的特殊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本书注重从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构筑。正文六编，试图从“天”、“地”、“时”、“相物”、“庶物”、“异物”六个主题元素来阐发，既独立成篇，又能构成一个整体。

如上所述，中国博物学的底蕴并非只是一堆关于“死物”的知识，而是对于整个外部世界的认识，是信仰、观念和情感的投射。因而，第一至第三编关注的是天命、星占、神祇、天下观、“地理观”、时令观对于信仰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影响，侧重于思想、宗教和文化象征意义的分析。第四至第六编偏重于具体名物考证。既然以“博物”为名，物的性理、名状和功能研究理应作为主体。第四编为相物法研究，追索包括相六畜、禽鸟、刀剑等各种相术在敦煌的雪泥鸿爪。第五编和第六编为蔬菜、土贡、异物、宝物的考察，尝试结合名物考证、语言学分析、现代科学知识和考古学的相关成果等研究工具进行考辨。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并非仅仅想正本清源，弄明白这些物品的名称、性状、原产地以及它们在敦煌以及中国古代医疗、农业生产、日常生活或民间信仰上的使用状况，而是希望以此为线索，追寻这些物的精神文化层面的意义以及一些值得珍藏的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的痕迹。总之，不同的专题，有的比较侧重社会思想的角度，也有的更侧重具体名物的考

证，但力求同时兼顾，使两者融为一体。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旨在构建敦煌博物学的基本框架和方法示例，不可能也从来没有想要巨细无遗地涵盖所有层面的问题。比如说，既然有蔬菜一编，为什么不写粮食作物、油料作物、药用植物、芳香植物、园艺植物、野生花草呢？这一方面固然是有史料所缺的原因，但根本上是我们认为研究范式才是最重要的，“同理可得”，就没有必要面面俱到了。

四、延伸阅读书目

本书最后罗列了核心参考文献。假如读者因此对博物学发生兴趣，希望进一步延伸阅读，自然是著者深感欣幸之事。特在此列出以下几位学者的，值得特别推荐。

1. 罗佛 (Berthold Laufer)。罗佛是杰出的汉学家、藏学家，曾任芝加哥富地自然史博物馆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亚洲人类学部主任，学术兴趣广泛，且精通十余种语言，自陶瓷、玉器至藏文鸟占文书，无不精研，著述甚丰。罗佛是少有的对博物学有自觉意识的学者，其著述眼光独到，史料丰富，考订精审。然而迄今为止译成中文的只有《中国伊朗编》。此书为治中西交通史者必读之经典，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博物学研究典范之作。罗佛尚撰有大量博物学论著，多由富地自然史博物馆出版或发表在馆刊上，勘为中国学者所知。可举出的重要著作有：《独角兽考》 (*History of the Rhinoceros*, 1914)、《麒麟：历史与艺术》 (*The Giraffe in History and Art*, 1928)、《飞行的古代史》 (*The Prehistory of Aviation*, 1928)、《鸕饲：中国与日本》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Cormorant in China and Japan*, 1931)、《土豆传播考》 (*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 Part 1: The Potato*, 1938)。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博品社曾组织专家将这些书译成日文，卷尾附译者后记，对罗佛治学理路多有抉发，亦颇有参考价值。将来译为中

文，应当以英文原本为基础，参考日译本加以校订。

2. 高罗佩 (Robert Hans van Gulik)。高罗佩为其中国性学史研究和《狄公案》等小说盛名所淹，其实是博学多才且最身体力行博物学知行合一理念的学者。我曾有幸参观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图书馆的高罗佩特藏，深为其涉猎之广所折服。为了观察长臂猿的习性，他亲自饲养了一只长臂猿，所著《长臂猿考》 (*The Gibbon in China: An Essays in Chinese Animal Lore*, Leiden: E. J. Brill, 1967)，匠心独运，资料翔实，并且融入了高罗佩自身的观察和情感，读来引人入胜。高罗佩还喜好书画和古物收藏，积十余年之功编著《书画鉴赏汇编》 (*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 Notes on the Means and Metho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nnoisseurship of Pictorial Art, Based Upon a Study of the Art of Mounting Scrolls in China and Japan*,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8)。此书涉及许多书写和装潢名物，关于书画艺术表现和卷轴装裱技艺之间关系的论列尤有见地，中、日纸质样品等实物资料蒐罗亦堪备检考，对艺术史和写本学研究皆有参考价值。虽因资料芜杂而为人诟病，但在我看来，这恰恰体现了博物学家追求“博闻多识”的品性。

3. 薛爱华 (Edward H. Schafer)。薛爱华曾长期担任加州大学伯克萊分校教授，为美国著名东方学家。名著《撒马尔干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已由吴玉贵先生翻译为《唐代的外来文明》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此书可以看作罗佛模式的优良继承者，是中古外来物质文明研究的又一里程碑式佳作。中译本改正了引文的一些错误并加了一些研究性的译注，极便读者。不过，薛爱华还有两部著作更能体现他的学识和才情：《朱雀：唐代的南方形象》 (*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1967)，自安南地域史、华蛮观念，以及天空、陆地、海洋、

动物、植物、矿物，无不毕涉。《步虚：探究唐代星辰之路》（*Pacing the Void: Tang Approaches to the Stars*, 1977），曾就唐代的宇宙观、星神崇拜、占星术和星占者做过精彩的考论。

4. 山田庆儿。山田先生在科学史领域建树良多，廖育群教授曾将其论著编译为《古代东亚哲学与科技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这里仅介绍其主编的论文集《东亚的本草与博物学世界》（《*東アジアの本草と博物学の世界*》，京都：思文阁，1995年）。文集所收山田庆儿本人撰写的导言及《关于本草的分类思想》最有启发性，关于幕府和江户时代日本博物学的几篇论文也值得一读。山田指出，本草不仅是中国的药物学，同时也是以药物的视点把握人类周边物类（动物、植物、矿物）的一种博物学。类书和本草书中的分类思想，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知识人阶层所构造的世界像，分类形式正是世界像的表现。这个关于人类活动诸领域的重层构造，既体现了官僚制支配下的生活与生产组织，中国社会构造对于秩序的维持，也包含了传统知识人的自我认识。

5. 小林清市。英年早逝的小林清市毕生致力于博物学研究，他的遗稿由京都大学武田时昌教授整理为《中国博物学的世界》（小林清市《中国博物学の世界：〈南方草木状〉、〈齐民要术〉を中心に》，东京：农文协，2003年）结集出版。此书主体部分为《南方草木状》译注和关于《齐民要术》的四篇专题论文，在第三部分“中国博物学纵览”中则收录七篇学术札记：《陆疏素描》、《吃虎豹怪树之话》、《清朝考证学派的博物学》、《经学者的昆虫观》、《魏晋时代的蝉》、《中国古代的昆虫观》、《关于雁之四德》等，更能显示小林先生的研究趣味和深厚功力。诚如武田教授在后记中所概括，小林主张“以中国博物学为素材，把它当作意味更广的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他实际上是想把博物学与思想史奇妙地融合起来，把博物学作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之道（approach）。